

·专著评介·

## 评郑樵研究两种

王记录

《郑樵文集（校补）·郑樵年谱稿》和《郑樵评传》是吴怀祺先生研究郑樵的两部专著。

前者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92年12月出版，后者由广西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7月出版。作者研究郑樵近二十年，不断创获。这两部专著将郑樵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是郑樵研究既具有总结性，又具有开创性的新成果。

作为中国古代最富有创见性的史学家之一，郑樵一生著述甚丰，内容博涉史学、经旨、礼乐、文字、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以及校讎、目录等各个学科。但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郑樵著作只有《通志》二百卷、《夹漈遗稿》三卷、《尔雅注》三卷。其著作散佚比较严重。本世纪二十年代，顾颉刚曾对郑樵的著作进行过清理和考订，写出了《郑樵著述考》，并辑录出郑樵的《诗辨妄》一书，做了一些初步工作。吴怀祺先生校补《郑樵文集》，则是学术界第一次对郑樵著作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其特点如下：

其一，广罗异本，校勘精审。《郑樵文集》是在《夹漈遗稿》的基础上增补整理而成的。作者将《夹漈遗稿》的各种刻本悉数网罗，有艺海珠尘本、函海本、四库文渊阁本和丛书集成本（此本系据艺海珠尘本排印）。另外还有鲍廷博所校《夹漈遗稿》清抄

本以及印有朱彝尊、乔松年诸人印章的《夹漈遗稿》清抄本。其中四库文渊阁本错讹较少，作者即以此作为校订底本，其余作为参校本。除此之外，作者还以地方志（如明代周华著《福建兴化县志》、清代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等）、宋人文集（如林希逸的《竹溪齋十一稿续集》、林光朝的《艾轩集》、汪应辰的《文定集》、曹勋的《松隐集》等）以及《莆风清籁集》、《莆阳文辑》、存素堂抄本《宋元人诗集》、樵月斋《郑氏宗谱》等作为校勘时的参照材料。在网罗各种刻本及相关材料的情况下，作者补缺、纠谬、订误、辨异同，出校勘记约 230 条，对前代各种刻本中的鱼鲁之讹，作了一次全面勘订。不仅如此，作者还发现诸种《夹漈遗稿》刻本中的一大错误，即：郑樵和郑厚曾先后两次上书枢密使宇文虚中，表达自己报国的志向，但诸本均将两次上书误编为一篇，将第一次上书的前半段和第二次上书的后半段连缀。作者在林希逸的《竹溪齋十一稿续集》中发现两次上书原文，遂辑补第一次上书所缺的后半段 250 字及第二次上书所缺的前半段 367 字，恢复了两次上书的本来面目。校勘之精，在以前从未有过。

其二，遍搜郑樵佚文、佚诗。郑樵文字，散佚甚多。前人编排《夹漈遗稿》，网罗不全。作者此番整理《郑樵文集》，广辑郑樵佚文、佚诗，从林希逸《竹溪齋十一稿续集》中辑出佚诗《建炎初秋不得北狩消息作》、佚文《书出后世民间》、《说字》、《夹漈听泉记》，从周华著《福建兴化县志》中辑出佚诗《百丈山》、佚文《上殿通志表》、《邑大夫丘君生祠记》、《跋寿峰丛桂堂记》，从《莆风清籁集》中辑出佚诗《哭林冲之》，从黄震《黄氏日抄》中辑出佚文《春秋论》25 条，从樵月斋《郑氏宗谱》中辑出佚文《荥阳谱序》，共 11 篇。这些佚诗、佚文是研究郑樵的弥足珍贵的资料，作者花大力气将其搜辑一处，无疑增加了《郑樵文集》的史料价值。

其三，编录郑樵的传记资料以及时人与郑樵的诗词唱和、文

章往来。重要的有《福建兴化县志》中的《郑樵传》，林光朝《艾轩集》中的《与郑编修渔仲》，汪应辰《文定集》中的《荐郑樵状》，曹勋《松隐集》中的《寄郑渔仲》、《祭郑编修渔仲文》等等。这些文字散见诸书，不易查寻，但它们都是研究郑樵学术和交谊的重要资料，如今编录一处，极便省览。

最后，作者将自己编著的《郑樵年谱稿》、《溪东溪西学术关系表》、《郑樵著述表》刊于《郑樵文集》之后，目的是为了互相发明，向人们展示郑樵学术的基本旨趣、源流及规模。《郑樵年谱稿》资料搜罗之全，在郑樵研究方面是第一次。作者在《年谱》中特别重视叙述郑樵的学问、思想、道德、人品，其方法值得借鉴。《宋元学案》及《宋元学案补遗》均将郑樵、郑厚附于《玉山学案》，作者认为不妥，拟定《溪东溪西学术关系表》，使人们看到二郑学术自有源流。《郑樵著述表》则以表格形式向人们展示了郑樵“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的学术规模。这些内容与《文集》合刊，更易使人们看到郑樵学术的方方面面。

总之，《郑樵文集（校补）·郑樵年谱稿》是迄今为止资料搜集最全、校勘最精的佳本，为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郑樵做了资料上的准备。

如果说《郑樵文集（校补）·郑樵年谱稿》侧重于对郑樵文献的搜集整理，为人们深入研究郑樵做资料上的准备的话，那么《郑樵评传》则深刻地揭示了郑樵学术的精神实质，从理论上将郑樵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其主要表现为：

其一，大力彰显郑樵的学术批评精神。在中国史学史上，郑樵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史学家，其批评锋芒涉及各个学术领域和古今重要学术家，其言词凌厉的批评，一直遭人非议，受人指责。自章学诚以来，人们对郑樵的学术批评有所认识，也给予了肯定。但是，郑樵学术批评的思想基点、尺度、目的到底是什么，则缺乏研究。作者通过深入探讨，指出学术批评是郑樵学术的中

心点，其批评的思想基点是独断之学和自得之学，其批评的尺度则是会通思想、摒弃灾祥、反对任情褒贬，其目的则是“开学者见识之门户”，也就是要打破因循守旧、无所创新的学术局面，进行独立思考。作者指出：“郑樵的学术批评是12世纪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要求思想解放的表现。”使人们对郑樵的学术精神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其二，从深层次揭示郑樵的治学路数及见解，总结郑樵的学术方法论。郑樵是一位具有创新意识的学者，其治学路数及见解鲜为人所理解。作者认为，郑樵的学术方法包括实学主张、类例方法和自得之学三个方面。对于这三个方面，以往也有人注意到，但它们究竟涵盖哪些内容，则缺少进一步分析。作者通过深入研究，指出，郑樵的实学，乃是有用之学，其表现在：第一，按事物固有的情形去认识、理解事物。第二，历史著作应具有社会价值，成为一代大典，史家的任务重在写好典章，记载实事。第三，自然知识和《诗》、《书》同等重要，强调实际观察。第四，明文字之本，以为明经之用。对于类例方法，作者通过研究指出，探究事物本末源流是郑樵类例、分类的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再强调细分，和那种仅从现象、形式上的分类法是不相同的。自得之学是郑樵治学的基本要求，但这种自得之学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作者指出：北宋庆历年间的疑古思潮、郑樵堂兄郑厚勇于批判的精神以及佛释的音韵原理是其自得之学的渊源，对传统文化及外来文化的批判继承，构成了他自得之学的灵魂。这些，均发前人所未发，深刻揭示出郑樵学术的真谛。

其三，从新的高度全面展开了对郑樵学术的整体研究，准确把握了郑樵学术的全貌。郑樵是一位大学术家、思想家，他一生“通百家之学”，博涉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的众多领域，且都有重大创获，学术规模宏大。如果只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研究郑樵，很难有一个完满的认识。而分别讨论郑樵各个领域的成就，如果

没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其评价又很难掌握分寸。作者在紧紧把握郑樵自得之学、实学主张和类例方法的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郑樵在史学、经旨、校讎学、目录学、音韵学、文字学、自然科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一一给予了深入研究，使我们看到，郑樵在各个领域成就卓著，但其旨趣都归于自得和实用。郑樵以自得之学、实学主张和类例方法在众多领域进行探索，执一统众，其学术博而有要、繁而不杂，自成体系。这样高屋建瓴地全面把握郑樵学术，是以前所没有的。

其四，在很多较为具体的问题上，作者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如《宋史·郑樵传》诬蔑郑樵“独切切于仕进”，作者用大量事实给予驳斥，恢复了郑樵甘于淡泊、献身学术的高尚人格。又如历来研究《通志》，均重视“二十略”，而对纪传部分则横加贬抑，作者在指出纪传部分的不足后，对其成就也给予了合理评价，并深入探讨了《通志》所反映出来的郑樵的卓越史识，使我们对《通志》的价值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再如作者通过对《通志》“六书略”“七音略”的分析，指出郑樵有一种大文化的观念，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有独特见解，具有将中外文化相结合的精神，其所绘等韵图，则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的产儿。作者还专辟章节，对郑樵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进行了研究，指出《通志》写入大量自然科学的内容，是一种科学的认识，郑樵提出将儒生和农圃人的知识结合起来，对于破除天人感应、谶纬学说等迷信思想意义重大。这些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激发人们不断重新认识郑樵。

吴怀祺先生治史学史，善于在各种思想见解的联结点上分析问题，同中辨异，异同窥同，充满了辩证思考的光辉。如从表面看，郑樵的实学思想与宋代的经制之学都重视典章制度的研究，并从中找出可供借鉴的经验，似乎是相同的。但作者经过深入分析，认为郑樵更注重历史记载的客观性，指出了其差异。郑樵在学术

上受堂兄郑厚影响很大，二人都有鲜明的批判精神，但郑厚的批判偏重于政治人物，郑樵的批判偏重于学术人物。自得之学在郑厚那里只是萌芽，而郑樵则通过自己的著述将自得之学变得更鲜明、更系统。这样研究问题，就避免了似是而非结论的出现，恰当地将被研究的事物置于合适的位置。这种研究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自公元 1162 年郑樵辞世至今的 800 多年时间里，郑樵研究不断被人们引向深入。在这个过程中，吴先生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整理《郑樵文集》，做资料上的清理工作，又第一次撰写全面评价郑樵行谊和学术的《郑樵评传》（二十年代顾颉刚曾撰有《郑樵传》，文章是根据地方志的材料写的，内容简略），提出自己对郑樵的种种看法，其在郑樵研究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当然，有关郑樵的评价还会有种种分歧，相信随着史学工作的发展，郑樵研究必定会结出更多丰硕的果实。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师大历史系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